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軍職父親之父職意涵，但國內對於軍人家庭的研究相當缺乏，遑論軍人之「父職」議題，因此文獻整理的架構將以整體性父職研究的發展與成果為分析主軸，先說明父職研究的發展簡要歷史，並將國內外父職研究上的進展作簡要歸納比較。其次分析父職意涵，主要從理論的觀點以及學者界定上的特色加以論述。接著介紹本研究所採用之生態系統理論，並依此理論架構評析國內父職研究資料。最後，分析軍職家庭的研究資料，論述軍職家庭的經營特殊性，凸顯本研究選取軍職父親為研究對象的意義。

第一節 父職研究的發展

根據國外學者的研究發現父職研究在 1970 年代之後漸受重視，於 1990 年代進入蓬勃發展的階段 (Lamb, 2000)，研究者以「父親 (father)、父職 (fatherhood or fathering)」為關鍵詞檢索國內外的資料庫，亦有相同發現 (魏秀珍, 2002)。故本研究以父職研究進入蓬勃期的西元 1991 年後之文獻為主進行分析與整理，作為本研究主題及設計之啟示。

從文獻資料發現父職研究從 1970 年代之後漸受重視，國內研究的起步較晚，多半是追著美國學術界的發展，直到 1992(民國 81)年才出現首篇有「父職」名詞的實證研究，落後美國甚多，但在最近的十年，每年都有父職相關的研究論文。何以父職研究從被忽略的家庭議題變為學者研究的新興主題 (Milardo, 2000)，學者有不同的見解。本節將從父職研究的背景、父職議題發展變化，以及父職研究之設計特色加以說明。

壹、父職研究的緣起

一、父職面貌變動，反映社會變遷

雖然有不同論點討論父親角色演變的問題，但是許多學者都指出父親角

色與社會的變動大有關聯，強調父職是深受文化脈絡的影響（Daly, 1995,引自王叢桂，2000a；Doherty et al., 1998; Peterson & Steinmetz, 2000; Walker & MaGraw, 2000）。例如：Hewelett（2000）從人類學說明早期人類生活中，男性角色在於「吸引異性」而非「養兒育女」，負責族群的生存問題，屬於保衛族群家園的工具性角色；隨時代演進後，捍衛家園與提供家族資源的角色明顯減弱了，養育性需求增加，所以父職由過去不是主要的家庭研究重點變成現代社會的焦點議題，因此Hewelett（2000）認為父親角色的變遷與人類社會的改變歷史有息息相關。

為了解父親角色的改變情形，Lamb（1996）在參考許多學者研究後，將美國父親在家中的角色行為做一歷史回顧，將父職的發展大致分成五個不同階段（詳表1），父親的角色與面貌呈現多樣性的發展（Lamb, 1996,引自Lamb, 2000）。

表 1 美國父職行為發展簡史

階段	社會背景與父親角色	當時父親的面貌
殖民時期— 共和國早期	父親扮演主要教育孩子的對象，是家中道德與倫理的模範對象，必須教導孩子正確的價值 - 父親「無所不知」、「無所不能」	提供孩子一個標準基督徒的生活與模範角色
1850 工業革 命前	父親與母親同時分擔孩子監督者的角色，但父親是家中賺錢者的角色漸漸變得很重要	標準基督徒模範、 增加了賺錢養家者角色
1930 年代 工業革 命後	經濟大蕭條時代的影響下，社會期許父親是個「有效率的男人 (effective men)」，賺錢者是最重要的父親角色	標準基督徒模範 賺錢養家者
1940 年代初期	二次大戰後，強調父親必須是家中孩子（特別是兒子）性別角色的重要依準。	賺錢養家者、 性別角色模範提供者
1970 年代	社會出現「新父親角色」的思潮 - 父親是敏感且積極參與孩子的日常照顧。	賺錢養家者、 增加了教養子女者觀點
1980 年代以後	社會期望父親能共同參與親職工作。但父親卻漸漸出走於家庭，在孩子成長過程中缺席。	親職中的失職者

資料來源：研究者根據 Lamb(2000)整理

此外另有學者提出更應從文化面去檢視父職的意涵，因為行為會消失，但是文化會繼續發揮作用力（LaRossa, Jaret, Gadgil & Wynn, 2000），而更能反映出現實社會中的父職。LaRossa 等人（2000）整理各學者從卡通、雜誌標題、電視廣告中分析所蘊含的父職概念，並針對近六十年來的連環畫中的父職價值觀資料，呈現美國文化資產中的父職發展圖像，發現這些父職發展圖像與 Lamb 在 1996 年整理的父職形象或是內涵變化相近（Lamb, 1996, 引自 Lamb, 2000）：在早先社會中是同時具有提供經濟與行為規範的帶領角色，其中或因為經濟環境改變、戰爭導致家庭人力分配產生變化，然而當社會發展漸趨穩定後，在 1970 年代左右出現「養育性角色」的父職訴求，有別於以往強調賺錢的「經濟提供角色」，將父職的議題帶入較多情感性角色的討論面，關注父親應多與孩子相處、持有較平等的性別角色概念且更願意照顧孩子，Eggebeen 等學者（2001）稱之為新父職（new fatherhood）時代的來臨（Eggebeen & Knoeater, 2001）；1980 年代後迄今，人們仍期望父親能共同參與親職工作，但是父親卻漸漸走出家庭，在孩子成長中缺席，Rotundo（1990）在其所著「美國父親（American Fatherhood）」一書中亟聲父親缺席現象嚴重（引自 Frank, 1992），學者據此現象，將父親歸屬不勝任的失職角色（Lamb, 1996; LaRossa et al., 2000）。由此可見，社會變遷也反映父職面貌的變動發展。

二、父職表現失職，引發美國政府介入

（一）父職負面觀威脅家庭穩定

根據前述，1980 年代之後父親的失職表現不受社會認同，而且對於家庭與社會的發展造成許多負面的影響。

Eggebeen 研究指出 1960 年代中期尚有六成的父親與孩子同住，到了 1990 年代則僅剩不到一半（45%）的比率（Eggebeen & Knoeater, 2001）。雖然高離婚率與未婚生子的比例上升，導致許多孩子都成長在單親家庭中，但多半以女性的單親家庭為主（Doherty et al., 1998; Eggebeen & Knoeater, 2001; Lamb, 2000; Scott, 2000）。學者認為雖然父母親失職的情況變多，但是父親失職的情形更嚴重（Goldsheider & Hogan, 引自 Eggebeen & Knoeater, 2001;

LaRossa et al., 2000)，特別是離婚後的父親情況更糟 (Braver & Griffin, 2000; Doherty et al., 1998)，引發所謂的「父職負面觀效應 (negative aspects of fatherhood)」(Eggebeen & Knoester, 2001) --女性寧可選擇成為單親母親也不願意有個不負責任的丈夫，使得女性在婚姻制度之外養育小孩漸成普遍 (Doherty et al., 1998)。學者認為父親失職與美國逐年增加的單親家庭中，以母親單親比例較高的現象有關 (Doherty et al., 1998; Eggebeen & Knoester, 2001; Lamb, 2000; Scott, 2000)，因此也促使進一步研究父職的需求。

(二) 政府強力介入，積極帶動研究

鑒於父親失職嚴重的社會現象 (Goldsheider & Hogan, 引自 Eggebeen & Knoester, 2001; LaRossa et al., 2000)，引起民眾與政府的關心，近年來美國從民間、政府皆紛紛發起「促進父職」的婚姻或家庭運動 (Scott, 2000)，而如何使父親成為負責任的親職角色，已成為解決家庭問題的當務之急 (Doherty et al., 1998; Walker & McGroaw, 2000)。

1995 年柯林頓總統推動父親參與家庭的政策，不僅對於父職的討論產生加溫作用，並促成不少官方與民間的合作研究 (Cabrera & Peters, 2000)。在當時成立的官方組織「父親與家庭國家中心 (National Center on Fathers and Families 【NCOFF】)」就扮演關鍵角色。1996-1997 年官方聯合法庭 (Federal Interagency Forum) 進行的兒童與家庭統計即是該組織經過多次會議所促成的。該調查資料成為許多學者分析父職的重要資訊來源。

1998 年可說是父職政策研究的高潮，在超過百名的政策制定者與學者合作下，出版了養育的父職 (Nurturing Fatherhood) 一書，以促進有關男性的生殖力、家庭建立、父職的研究等。這樣的發展，顯示政府對於「促進父職」的推動上確實功不可沒。

三、父職意義受重視，學界捧場功不可沒

學者認為促使 1990 年代父職研究蓬勃發展的原因之一是學術界配合當時社會政策的研究風潮 (Lamb, 2000)。雖然每種理論訴求不同，但皆關注男性的父親角色，對於近年父職研究的發展造成不小影響。

Eggebeen & Knoester (2001) 指出父職研究不若母職研究來的豐富，與

父職較少被視為是成人必須面對的轉變事件有關。尤其英國的神經科醫生 Bombly 在 1951 年提出母親是扮演孩子成長初期的最重要角色的說法（引自 Lamb, 2000）後，幾乎鎖定母親是扮演孩子成長中最重要親職角色，無論是哪個階段的孩子教養問題，都關注在母親的身上，母職儼然是天職（刁筱華譯，1996）。雖然後來的學者對於 Bombly 的看法多所質疑，但是母職成為女性的必要角色已深深成為社會所共同認定的標準，相形之下，父職也就不那麼受重視了。儘管學者強調在孩子的成長中，父母皆扮演同等重要的角色，但是從研究的角度來說，討論父職的主題顯然比研究母職的要少的多。

然而歷經社會變遷的影響，重視父親角色的論述再度被關注。Lamb（2000）認為性別平等意識的興起及幾個理論強調父親對孩子發展影響的重要性，都對父職研究產生重要的作用，例如弗洛伊德、班杜拉等心理學者的觀點指出父親是孩子性別角色認同與行為模仿的重要對象，帕森斯的社會學論述，則強調父親是孩子社會化過程的重要引導者。

近代女性主義理論的興起，強調婦女權益，認為過去父權社會強化女性母職角色，不僅對女性造成莫大壓力，也讓男性輕忽父職。女性主義學者指出兩性角色分工隨著社會變遷而產生變化，女性可以像男性一樣分擔賺錢養家的經濟性角色，男性也應當分擔子女的教養責任（王佩玲，1993），由此可見父職議題確實被學者關切。

歸結來說，父職研究約源自於社會變遷的歷史背景，引發父親角色須改變的衝擊，然而男性的父親角色並未扮演如社會期望般的盡責，造成父親失職的社會現象。當政府覺知問題的重要性而扮演主動促進父職的角色後，學者從不同理論的觀點強調父職的重要並呼應政策紛紛投入父職的研究，漸漸奠定了今後父職研究的基礎。

貳、父職研究議題取向的發展

對於父親是個失職者的論點，學者認為與過去缺乏父職研究有密切相關（Feldman, Nash & Aschenbrenner, 1983, 引自 Baber & Dreyer, 1985），因此分

析以往父職研究資料，應有助於父職研究發展。礙於時間與精力之限，且考量父職議題的發展於1990年後進入蓬勃階段，故選定1991年以後的父職作為資料本研究文獻整理的主軸。其中西文部分以發現父職研究數量最多的「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簡寫JFM)」、「Family Relations(簡寫FR)」兩本期刊為資料對象，另加上「Marriage & Family Review(簡寫MFR)」於2000年編輯之「父職」專刊中研究資料。至於中文部分研究文獻較少，故在經過整合資料庫查詢後的摘要資料篩選出具實證性研究文獻皆囊括，其中多數為碩士論文。大體而言，父職研究的主題大致與Marsiglio等人(Marsiglio, Amato & Day, 2000)的歸類相近，但也有些差異(魏秀珍, 2002)。茲將國內外研究資料，參酌Marsiglio等學者的分類而歸納為四種主題類型，整理成附錄1及附錄2，並依研究旨趣、研究對象、主要成果概略說明如下：

一、類型一：討論父親角色或職責內涵

這類主題普遍見於國內外的父職研究中，為近年來主要研究焦點之一。

(一) 研究旨趣：多半是為了對「父親行為」有明確的認識。

(二) 研究對象：國外運用較多樣的研究方式在討論父親行為，選用文本分析者，範圍包括父母信件、報紙漫畫、海報卡通等；國內則以分析文本最多，鎖定孩子的讀物為主要範圍。

(三) 主要發現：國內外在這部分的研究發現差不多--父職概念仍偏向傳統性別角色意識、扮演不利，但漸漸改善。父親在孩子的讀物、雜誌媒體中的出現率是明顯低於母親的、鮮少出現在家中，不僅反映出親職的傳統性別意識外，也顯示社會文化重視父親的情形仍遠不及於母親。此外，父親行為在文本資料中往往是不勝任的親職或是可笑的(LaRossa, Gordon, Wilson, Bairan & Jaret, 1991; LaRossa et al., 2000)，經常被作者以較負面的形象呈現，如張子樟(1998)從少年小說中的內容分析出父親是虛無的或是失敗的，並指出這種父親角色對少年產生不良的影響。

雖然父親的圖像在文本資料與實際現況中皆呈現傳統的、缺席

的，或不當的親職情形，不過近年研究已發現「養育性父親」漸漸成為現代父職的新趨勢，不僅反映在文本資料中，也反映在年輕父親與孩子的「未來父職」角色期待上（王叢桂，2000b；黃慧森，2001）。

二、類型二：探討父親與孩子發展相關的因素

此類研究出現時間最早，然而研究數量並不多。

- (一) 研究旨趣：驗證父親角色對孩子發展的意義與重要性。
- (二) 研究對象：多半為小學階段以上的小孩，尤其是中小學階段孩子的比例最多。這應該與以填寫問卷為主要研究方法有關，因為孩子必須要有識字的能力。
- (三) 主要發現：父親的行為表現或觀念與不同階段孩子的發展確有關係。相對於其他議題，本主題上的討論數量是較少的，或許與親職文化的「重母職」現象有關。然而國內外學者都肯定父職的重要，只是國內外學者探討的數量與類型皆有些不同--國外研究較關注在孩子行為問題面；國內研究較鎖定在學階段孩子的發展情形或是學習成就。如父職行為與孩子性別角色態度發展有關聯，特別是未來親職角色概念的期望上影響頗大，當父職表現愈性別傳統分化取向者，孩子的親職概念期望也就愈符合傳統的性別角色分工(王叢桂，1997、王叢桂，1998，引自黃慧森，2001；林震雯，1993)。還有研究指出父親行為比母親更能預測孩子的行為（詹美涓、黃迺毓，1993），而父職表現對於兒子的父職行為表現深具影響力（Furstenberg & Weiss, 2000），青少年的負面社會行為更與父職的參與有密切關係（Salem, Zimmerman & Nataro, 1998）。

三、類型三：分析影響父職的因素或角色適應問題

這個主體的討論可說是近年來父職研究的熱門議題。

- (一) 研究旨趣：期望了解父親角色在執行上會受哪些因素影響，較能為「理想父職」提供有用的分析與策略建議。

(二) 研究對象：以家庭成員為對象的研究為主，又以父親為對象的探討最多。

(三) 主要發現：影響父職的因素相當多。國內外討論的焦點都在家庭部分，又以針對父親的分析最多。國外學者重視父親因素外，對於家人互動、家庭結構或組成上等的不同家庭因素探討的也不少，比較特別的像是「父親是否與孩子同住」(Furstenberg & Weiss, 2000; Shapiro & Lambert, 1999)、「孩子是否婚生」(Eggebeen & Knoester, 2001)、兄長當父親的年齡 (Dearden, Hale & Blankson, 1994; Furstenber & Weiss, 2000) 等。相較之下，國內偏重於個人因素面的探究，分析面較不若國外多元。

至於家庭外因素的分析，兩地學者都注意到父親或母親的工作面，但是國外學者從大環境面切入研究的更多，像是社區環境 (Thronberry, Smith & Howard, 1997)、國家相關政策與促進父職的關聯 (Brown, 2000; Cabrera & Peters, 2000)、種族差異 (Averett, Gennetian & Peter, 2000; Marsiglio & Cohan, 2000)、與政治經濟因素 (LaRossa & Reitzes, 1993a; LaRossa et al., 2000; Marsiglio & Cohan, 2000) 等等，都是國內研究中看不到的主題。

四、類型四：促進父職之理論觀、教育課程設計或政策規劃

這是所有研究議題中發展最晚且篇數最少者。

(一) 研究旨趣：尋求「方法或執行策略」以強化父職。

(二) 研究對象：以父親為主。為了對男性的父親角色提供實際協助，有些學者們試著運用理論觀點來解讀父親角色職責的發展特性，並據以提供分析父職的有效論點；有些學者試著規劃實用的教育或方案以落實促進父職的想法；有些學者則根據前面相關父職因素的討論進而對政策制定或親職教育的設計上有所建言。

(三) 主要發現：僅有的研究中，只有三篇屬於方案規劃的實驗設計，其

中國外 Braver & Griffin (2000) 的研究對象是 300 對以上的離婚父親，進行 8 週/次的方案課程；Anderson, Koheler & Leticq (2002) 是選取美國中西部低收入家庭，且曾參與「父責任父職」課程的 20 位父親，以焦點團體訪談的方法，了解這些父親的課後感想及其對於未來父職教育課程的建言；郭佳華（2001）則是針對一般家庭中的父親 16 位設計 5 週/次的課程。雖然三個研究對象的性質與數量上差異很大，但是都發現父親確實因為參與課程而增進了家庭或親職角色的知能，可見為父親量身訂做的親職課程應有其效益，不過勢必須要更多的研究來證明這個看法。

參、研究設計特色

分析 1991-2004 年間的父職研究資料，歸納出有關父職研究設計具有漸以父親為主要研究對象、質性研究取向漸增、國內外研究工具差異大等三項研究設計特色，茲說明如下：

一、研究對象：父親聲音漸多

過去有關父親角色的討論多是從發展心理學的觀點著手(Lewis, 1986, 引自黃坤瑛, 1988)，重點在於孩子的發展問題上；加上傳統的親職文化中母親才是被定位為與孩子最直接相關者，所以關心孩子發展的人自然想到母親、想到孩子，忽略父親。王大維(2000)於民國 89 年檢索國內博碩士論文標題中出現「父親」或「父職」的論文僅 11 篇，比起「母親」或「母職」的 128 篇，相差甚多，許多學者都批判親職研究中相當缺乏父親的意見，父親僅屬於「後備」式的親職角色。這幾年父職議題受重視後，國內研究情勢變化如何？當研究者再次進行相同查詢，博碩士論文研究標題中有「母職」或「母親」者有 257 篇，仍舊遠多於含「父職」或「父親」為標題的 44 篇（檢索時間:2005 年 6 月）。基於前述親職研究發展背景，加上從事親職教育工作者都體認到父親參與總佔少數的現象，因此研究者甚至質疑父職研究的對象是否也多半來自母親的意見？是以將資料一研究時間及按研究意見來源別加以整理，發現父職研究領域，無論國內外都是以父親為研究對象的比例最

多，且愈]晚近的趨向愈明顯（詳表 2）。

表 2 1991-2004 年父職論文之研究對象統計 總篇數：國外 50 篇，國內 57 篇

國別**對象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總計	
國外 (50)	父	1	1	1	0	0	1	1	0	1	4	1	1	2	0	14
	母	0	0	0	1	0	0	0	1	2	3	0	0	0	0	7
	子	2	0	0	1	0	0	1	1	0	3	0	0	1	0	9
	夫妻	0	0	0	0	1	1	0	1	0	1	0	1	0	1	6
國內 (57)	父	0	0	2	1	0	2	0	2	3	3	3	0	4	7	27
	母	0	0	1	1	0	0	0	0	0	1	0	0	1	1	5
	子	0	1	4	0	0	2	3	2	2	2	2	0	0	2	20
	夫妻	0	0	2	0	0	0	1	0	0	1	0	0	0	1	5

*屬於文獻分析的研究資料，無法計算於本表，故合計篇數與總分析篇數不合。

**非配對式的夫妻研究資料分別採記次數，不歸於一配對式的研究數量中。

從表中的數字變化可以發現，以「父親」為研究主體是這些年來父職研究的發展趨勢，而國內又比國外要明顯，學者顯然注意到「父親聲音」的問題。若進一步察看其他研究對象的篇數時，會發現國內外以母親為對象進行父職議題之研究比例皆低於以孩子為研究對象的論文篇數，國內尤其明顯。可能是因為國內研究多半參考國外資料，在進行資料蒐集時會發現國外學者提到「母親聲音」多於「父親聲音」的父職研究歷史，設法避免「女性經常是提供家庭訊息的發言人」的現象 (Rothschild, 1969, 引自王舒芸、余漢儀, 1997)，而採取刻意降低母親意見的策略，加上親職研究強調「發展心理學」，關注焦點都孩子的發展上 (Lamb & Elster, 1990)，不難解釋國內從孩子去探究父職的研究數量遠超過以母親為研究對象的情況。至於以夫妻進行父職研究的數量最低，或許與研究進行的困難度較高有關。

二、研究方法：質性漸增

Marsiglio 等學者 (Marsiglio, Amato & Day, 2000) 分析美國父職研究方法雖仍以量化為主，但朝向質性研究漸增的趨勢發展。當研究者將研究方法依量化統計、質性方式、質量並用等三種形式做歸納時，統計結果與 Marsiglio 等人 (Marsiglio, Amato & Day, 2000) 的發現相似 (詳表 3) --國內外的父職

論文以量化研究設計為大宗，質性研究者漸漸增多，這種現象又以國內更為明顯。

表3 1991-2004年國內、外父職論文之研究方法統計

國別	研究法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合計
國外 (50)	*質	0	0	1	0	0	1	0	1	0	8	0	1	0	0	12
	量	2	1	2	2	1	1	2	2	4	9	2	1	3	1	33
	兼用	1	0	1	0	0	0	0	1	0	1	0	0	1	0	5
國內 (57)	*質	0	0	1	0	0	1	1	1	2	2	4	0	1	5	18
	量	1	2	5	2	0	4	2	4	3	2	1	0	3	3	32
	兼用	0	0	0	0	0	0	1	1	0	2	1	1	0	1	7

*屬於文獻分析之論文皆歸屬於「質性研究」之列

Marsiglio 等學者 (2000) 分析父職研究過去側重量化取向的原因與研究測量法的使用、女性主義運動有關 (Marsiglio, Amato & Day, 2000)：

(一) 測量法的使用：時間使用 (time-use) 是父職研究常用的量化分析方式。

這種測量法在 1920 年代廣為社會科學家與家政學者所使用，而且持續數十年的發展。到了 1970 年代用於父職的研究則關注在「父親花多少時間在孩子的身上」，以「時間量」為自變項，用以定義父親盡職的程度，或是檢測與孩子發展間的關聯。

(二) 女性主義的思潮：促進父職的量化研究。

第二波的女性主義運動約起於 1960-1970 年代，開始影響婦女對於家庭的看法，質疑陽剛父親會在教養過程中強化男孩的陽剛特質—攻擊性強的。為避免落入主觀價值取向，女性主義學者主張以量化方式研究父親親職行為的種類、數量、程度等，希望用實證研究的數據資料來客觀的解釋父職內涵與行為。

除前述因素外，也應與研究方法的演進歷史有關，絕大多數的家庭研究者都是接受量化訓練及實證主義的思維模式 (Gilgun, Daly & Hamdel, 1992)。1940 至 1970 年代，量化方法成為研究設計之主流，特

別是標準化訪談及問卷調查成普遍化的標準做法 (Wampler & Halverson, 1993, 引自 Marsiglio, Amato & Day, 2000)；雖然從 1960 年代起家庭研究漸漸開始出現質性研究的色彩，不過量化研究持續主導學術研究領域，1970 年代可謂是量化研究風氣最盛時期。大約在 1980 年代後期美國學界才繼續發展與接受質性研究法 (劉仲冬，1996)，質化研究正式進入家庭領域，一直到了 1990 年代質化研究的方法才逐漸受到重視 (Doherty, Boss, LaRossa, Schumm & Steinmetz, 1993)。當對照表 3 看父職研究方法的數字變化，可以發現近年來以質性方法進行父職研究的數量確實有增加的趨勢，而國內跟進質性研究的風潮似乎比國外更明顯。

三、研究工具：國內外有差別

雖然國內外父職研究方法上的運用相近，但用以蒐集資料的工具卻有不同，茲說明如下：

(一) 量化研究的樣本來源差異大

表 4 為國內外量化研究的樣本來源，可以看出國外經常運用現成的大型資料庫做統計分析，國內則是研究者自行抽樣取得樣本為多。

表 4 1991-2004 父職量化研究樣本來源比較 (含質量兼用篇數)

國別 *論文篇數		樣本源			
		大型資料庫	文本	自行抽樣	
國外	38	22	5	11	
國內	38	0	10	28	

*國外 50 篇論文中 38 篇運用到量化的研究方法。

國內 57 篇論文運用量化研究之篇數亦正巧為 38。

(二) 質化研究偏重訪談法

質性研究的主要目的不在於推論性而是發現並瞭解人們行、知、思考或感覺些什麼 (吳芝儀、李奉儒，1995)，與量化研究的取向截然不同，基於不同的問題需要，往往會用不同方式蒐集資料分析，像是田野調查、訪談法、觀察法、文件分析等。從表 5 可以看到用於國

內研究父職的質性方式以「訪談法」最多；國外以「文件分析」居冠，文件內容包括多種類型的文本（如：漫畫、信件）與研究文獻資料。

表 5 1991-2004 父職質性研究資料蒐集方式比較（含質量兼用篇數）

國別	研究篇數	方式				
		訪談	焦點座談	文件分析	觀察法	方案課程
國外	17	5	2*	10	1	2**
國內	25	18	3*	2	2	1

*有一篇研究同時使用個別訪談與焦點座談

**有一篇研究同時使用個別訪談、焦點座談；一篇採用焦點團體進行

從前面的整理結果不難發現國內外的研究設計、方法與工具的選用、關心的主題有所異同。相同的是父職研究是朝向「促進父職」的趨勢在發展的；不同的是在這個共同的目標下，選用的研究策略、關心的問題與對象、運用的方法略有差別，這些差別或許是研究速度上的差異；也許是國情文化的影響，然而皆對於父職研究的發展已建立相當的基礎。

由父職研究發展的資料，可以了解父職議題有隨時代性變化的特色，從早期偏重父親對孩子發展影響而由不同對象或是素材加以探討父親形象，漸漸因學術風潮與研究典範朝向後實證主義發展，關注在父親本身的想法成為晚近研究的主流，目的皆在於促進父職。經由前述文獻整理與分析之心得，對於本研究在父職主題與研究方法的選取上皆有所啟示。

第二節 父職意涵的討論

在歸納過去研究發展趨向後，本節將深入探討研究中如何界定「父職」，以作為本研究分析之參考。

壹、父職意涵「如何來？」--理論解讀之別

國內在父職研究的進展明顯增多，但相對於國外研究來說，明顯欠缺理論基礎的研究現象（魏秀珍，2003），令人感到說服力不足，難以推論應用於社會現象。根據文獻可知，國外學者為了解釋「父親失職」的社會現象，紛紛從不同的理論加以闡述，希望能從多方觀點說明「父職的面貌」。參酌多位學者整理不同的理論解讀父職，茲就各理論的研究取向，與該取向下的父職意涵歸納如表 6，並進一步說明如後。（Bubolz & Sontag, 1993; Kingsbury & Scanzoni, 1993; Lamb, 2000; LaRossa & Reitzes, 1993b; Marsiglio, Day & Lamb, 2000; Marsiglio, Hutchinson & Cohan, 2000）

- 一、**生物性觀點**：採取性別角色分工的說法，主張父母職責根據兩性生理上的功能與特徵作職責分野，這也是社會文化傳承親職性別分工的支持論點之一。
- 二、**結構功能論**：以 Parsons 為代表的結構功能論，強調社會應是個有固定規則的結構體，各角色在既定的規則下盡任務，期望社會秩序穩定。此論主張男女應有不同的職分，男主外兒女主內，將親職歸屬於母親的家內任務。
- 三、**社會建構論**：父職的角色任務並非固定，是隨著社會變動而改變的，因此認為父職是社會建構的成果。主張此論的學者相當多，關心的是社會所提供的父職脈絡如何運作，且提出新父親的形象說法。
- 四、**社會資本論**：從孩子的成長角度來說，父親如同是種資產，相當接近社

會交換論中的「市場-利益」觀點。好的父職將有助於孩子良性發展，是為有利的資源；反之，則對孩子的成長造成負面影響，應屬於不利資源。美國的「父職負面觀」(Eggebeen & Knoester, 2001) 效應，可謂是父職被定位為不利資源，對婚姻與家庭產生負作用的社會現象。

表 6 美國父職研究之理論及運用觀點

理論	研究取向或觀點	父職意涵
生物性觀點	父職是兩性分工的自然現象	父親是賺錢養家的工具性角色
結構功能論	父職有符合社會既定結構的任務	父親負責家庭安全與經濟的工具角色
社會建構論	父職是建構出來的	隨著外界社會改變而變
社會資本觀	父職影響孩子福利	父親是影響孩子發展的重要資產
家庭系統或生態理論	父職由多人共同促成	是男性與生活環境及相關人員互動的結果
發展心理學	父職是父子關係互動的動態過程	父親是孩子心理認同發展的重要依據
符號互動論	父職在理想與現實中比較而產生	父親的言行如同孩子學習的訊息符號
後現代與現象學觀	重視父職建構的過程，強調男性主體意識	沒有單一的理想父親模範
生命歷程理論	重視父職建構的社會路徑與變遷歷程，強調人事物間的互動	父親感受的父職時間點受生命中不同事件影響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五、家庭系統或生態系統理論：強調家庭如同有機生命體，個體彼此相互牽動並與生活的全面環境有所關聯，因此父親的職責角色是與生活各層面中的人、事、物互動的結果。其中 Doherty (1998) 等學者 (Doherty et al., 1998) 所提出的父職生態觀點結構最明確。

六、發展心理學：認為父親是孩子心中認同發展的重要依據。父親形同學習的典範，提供孩子成長的參照線索。反過來，父親感受的親子互動結果也對父親內在所詮釋的父職產生作用。

七、**符號互動論**：主張人對於個人行為或職責的意義，是透過感知每天與他人互動歷程而建立。以父職來說，父親的行為舉止就像是一種符號，經由孩子的解讀後作為成長學習的訊息依據。同樣的，父親從每天的生活歷程中，體驗與捕捉父職的意義。

八、**後現象與現象學**：認為父職的形象並無單一標準，關注的是父親在與環境互動時形塑出父職的過程，強調個體的主體意識感覺。要注意的是個體置身的環境對當事人造成何種意義。

九、**生命歷程理論**：認為父職的形成為一個動態歷程，強調社會建構的路徑與轉變方式。因此，不僅要注意個體的背景脈絡，還要關心生命時間軸上的人物互動與生活事件的影響力。

表中各論述對於父職/父親研究的主張不盡相同，但未必互斥：有些理論強調父職是種結果，是來自於家庭經驗、社會、文化的影響，關心影響父職的可能原因；有些指出父職是動態的建構過程，隨著生命階段的發展會有不同的父職，試著解釋父職概念的變動性；有的則認為父職是沒有標準的理想模式，更重要的是去理解男性主觀感受。基本上，後期的理論會參酌先前的論述再修正，而且愈屬晚近成形的理論，愈選取「父職是與社會中的人、事、物互動」的結果，並非單一因素使然。

雖然不同理論切入觀點有別點，然而從學者的研究中可以發現能呼應這些理論的實證資料並不充足，部分仍有爭議，尤其是對於父職概念的演變問題，一些學者認為僅止於純理論式的意見為多(LaRossa et al., 2000; Walker & MaGraw, 2000)。國內的父職研究明確運用理論者亦相當少，研究中幾乎都未採具明確的理論作為研究設計或分析的架構，而多半屬於隱含性的應用在不同研究步驟中(魏秀珍, 2002)。這與 Lavee & Dollahite (1991) 分析家庭研究資料的發現相似—即家庭研究中運用理論的比例相當低。

貳、父職意涵「是什麼？」--學者的研究界定

許多學者都提出父職應該朝向「負責任」的趨向發展 Levine & Pitt (1995) 將負責任的父親界定為「對自己的孩子有責任感」(引自郭佳華, 2000); Lamb(1997)提出父親就像母親的看法-要扮演多重角色(引自 Lamb, 2000)。國內的研究人員也持相似觀點—即不刻意將父職的內涵與母職或親職有明顯的區隔。但是「負責任」的父職意涵該包括哪些?似乎每位研究者說法不一,從文獻的研究取向或是研究設計的方式來看,大致可以分成三種著眼點:

一、父親「作了哪些？」--關心父職意涵的參與項目

絕大多數的研究都傾向將父職作明確的工作界定,尤其是量化研究者,分析父親作哪類的工作最多,或是被期望作哪些工作。這種研究優勢在於提供了具體的指標以作為評估父職進了哪些責任或是傾向扮演哪些職責角色。茲將國內學者提出具體的父職任務項目作一對照整理如表 7,以增進了解。鑑於早期親職角色界定為情感性或工具性兩種不同向度,但後期的學者做更多的區分,為便於了解,參考各研究中提出具體的父職職責項目分項說明,並以家庭內與家庭外(學校)的參與為區隔,融入工具性程度與情感性程度加以排定。四種程度排列說明如下:

- (一) 傳統工具性角色:指傳統將父親進界定在賺錢與角色示範者,較不涉獵照顧孩子的層面,是有距離的親職角色。
- (二) 關切孩子能力展現:除了賺錢養家外,關心孩子學習成就者則歸屬此類,因此研究者提到與孩子學校學習或能力培養者,皆歸於此類中。
- (三) 參與孩子生活照顧:這是指父親會在家庭中照顧子女的生活,確實扮演生活照顧者的親職角色。
- (四) 陪伴互動的親職:這種父親與孩子有情感性的交流,涉及更多的心靈關懷與照顧,屬於情感性角色。

表 7 國內父職界定的內容分項歸屬

研究者 (時間)	偏傳統工具性角色 ← - 父職意涵面向 - → 偏情感性角色			
	提供養家示範	子女能力發展	日常照顧子女	關懷陪伴子女
林生傳 (1979)	工具性角色			情感性角色
黃坤瑛 (1989)	家庭領導與代表 家庭決策與設計 家庭與安全照顧	社會化歷練	子女教導	
林震雯 (1992)	家庭穩定的維持	引導智能發展	生活照顧	心理與情緒輔導
陳淑貞 (1993)	工作層面			遊樂層面
莫藜藜、 王行 (1995)	生活提供者 管教角色			玩伴角色
王麗玲 (1996)	管教方式		生活輔導	親子關係
王叢桂 (1996)	養家示範	能力發展	日常照顧	關懷陪伴
王叢桂 (1997)	經濟支持	子女發展 教育子女	生活照顧	和諧關愛
陳曉慧 (1999)		課業發展 社會性發展	生活照顧	心理發展
張佩韻 (1999)	經濟的提供者 子女的規範者 性別角色認同	積極規劃教育		心理關懷
林莉菁 (2000)	保護與疏離的 養家者 子女道德紀律的 管教與導師 性別角色模範者			
蔡佳宜 (2000)		學校相關涉入	生活自主教育	支持鼓勵 活動陪伴
黃慧森 (2001)	照顧與管教 養家與身教	教育與栽培		陪伴與支持
陳秀如 (2001)	教養與育兒 知識的學習	子女學習 相關活動	子女托育情形 子女社交生活的 參與	休閒娛樂活動 與子女聊天情形 情緒及行為輔導
吳黛宜 (2002)	養家示範	能力發展	日常照顧	關懷陪伴
李慧美 (2003)		課業發展 學校參與	生活照料	關懷輔導 陪伴支持
梁志彬 (2003)	經濟支持	子女發展 教育子女	生活照顧	和諧關愛
徐麗賢 (2004)	經濟支持	子女培育 子女發展	生活照顧	關懷輔導
黃松溝 (2005)	經濟支持 常規養成	學業指導 社交知能		關懷引導 陪伴支持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從表 7 內容看來，似乎無法將父職、母職做明確劃分，「父職」的意義、內容皆與「親職」的精神相仿，差別在於行使親職的對象為父親爾！如果排除「父親參與不若母親」的社會現狀，我們是否可以假設「當父母親扮演相當親職責任時，對子女的影響力可就旗鼓相當？然而，已有研究提出父親、母親對孩子的影響狀況不同，甚至有不少學者指出父親的影響力更甚於母親（王佩玲，1993；呂素美，1990；詹美涓、黃迺毓，1993；蘇建文，1978，引自李明珠，1988）。這是否意味著父母親的親職行為對孩子來說有不同的意義？或許與他們表現的親職行為不同有關，例如：父母親表達「關懷」的方式有別，造成子女感受上的差異。

二、父親「作了多少？」--關心父職意涵的投入程度

除了涵括式的界定父職工作內容外，也有學者從投入親職的程度著眼。Lamb 與其同僚於 1985 年首次提出提父親投入（paternal involvement）程度的分析觀點（Lamb, 2000）。Lamb（2000）認為父職包含太多的活動，難以界定明確工作項目，採取父親的參與程度則是比較明確的說法，並認為父親投入的類型可以分為以下三種：

- （一）約會型（engagement）：父親與孩子屬於一陪一（one-on-one）式的接觸，有實質的互動，像是陪孩子玩玩具。
- （二）接近型（accessibility）：這種涉入未必與孩子有實際互動但在父親感知範圍的活動都算。例如：在廚房烹煮食物而孩子坐在旁邊的地上玩耍。
- （三）負責型（responsibility）：這最難界定的形式，不見得有直接照顧的行為，只要是父親有實質想法去關心與照顧孩子的福祉者皆涵括，範圍相當大。例如：幫孩子找優質合適的托兒所。

Barnett 與 Baruch (1987)也採用投入程度的方式探討父職，但不像 Lamb 等學者（Lamb, 2000）有做程度差異的界定，而是投入量(時間)之比較，發現父職扮演的程度隨孩子年齡大小呈現鐘形曲線的變化(Barnett & Baruch,

1987, 引自白怡娟, 2004)——在嬰兒期間投入程度最少, 幼兒期父職扮演程度最高, 但自此後父職扮演逐漸降低程度, 而 Salt(1991)調查 7-12 歲的兒子感受, 同樣指出兒子年齡增加, 父子接近時間減少, 另外 Glass(1998)研究生涯家庭中父親參與一歲前子女的照顧情形, 也發現父親照顧子女的時間會隨嬰兒的年齡增加遞減。

三、父親「適時表現？」--關心父職意涵的階段特性

還有一類的觀點視父職應有階段意涵之別, 採取人類發展有不同階需求的說法。Stoop(1995)將父職意涵作明確的階段劃分, 認為父職扮演的內涵隨孩子發展不同有所區隔——0-5 歲的嬰幼兒階段, 父親是養育者; 6-12 歲的孩童時期, 父親是規範行為者; 12-18 歲的青少年時段, 父親扮演保護者的戰士角色以及提供智慧的問題解決者; 孩子 18 歲以後的成年階段, 父親成為孩子的精神導師(引自柯里斯、林為正譯, 1995)。

Dollahite 與 Hawkins (1997)出版「Generativity Fathering」一書, 也主張要以人類發展需求作為父職任務說明的基準, 鼓勵父親做好父親的工作歷程——透過各種工作 (work) 來滿足孩子各階段發展的不同需求。事實上, Generativity 最早是由 Erikson 提出, 視 Generativity 為成人階段的一個發展危機或是必須履行的任務, 而 John Snarey(1993)將此階段論應用於父職研究上(引自李淑娟, 2004), 李淑娟 (2004) 據此論 (父育理論) 進行國內本土化量表編製與理論間的檢證研究, 指陳父職意涵確有階段性類型, 但李淑娟的研究結果並未完全對應各階段性的父職內涵(ex: 幼兒期的父親會有較明顯的幼兒期父職表現), 或許如李淑娟 (2004) 所言孩子數往往不只一人時, 發展階段有所交疊難以明確劃分, 再加上研究對象並非真正的隨機尋得且屬於成人對於其父親的回顧性資料, 致使結果難免有所偏頗。

歸結來說, 在父職意涵的討論上, 國內外多數採取內容上的分類為主(即認為父職應包括哪些工作項目), 部分學者主張該關心的是父職投入程度的問題 (程度不同表示親子互動型態與密切度也會不一樣), 也有學者從孩子發展需求提出階段性父職的概念 (不同孩子階段該提供哪些父親工作)。三種切入點看見不同的面向, 不過共同顯現的核心是關切能否滿足孩子的發展

所需，即父職意涵朝中性化發展趨向，與 Marsiglio, Day & Lamb(2000)的發現相似--回歸到以孩子為中心的思考上。

參、什麼「影響」父職—因素面探討

陸續的研究都肯定父職對於孩子發展有相當影響，雖然研究篇數不如討論母親對孩子影響力的多，但是研究發現也相當可觀。早期盧美貴（1985）的研究就指出父親對孩子的關懷有利其學習動機（引自陳美芬，1995），又如父職行為與孩子性別角色態度發展有關聯，特別是未來親職角色概念的期望上影響頗大—研究顯示父職表現愈性別傳統分化取向者，孩子的親職概念期望也就愈符合傳統的性別角色分工(王叢桂，1997、王叢桂，1998，引自黃慧森，2001；林震雯，1993)。又如詹美涓、黃迺毓（1993）的研究指出孩子知覺到的父親不同支持向度之教養行為比母親更能預測不同性別、不同排行子女之自我價值，其中以對長子的自我價值有 27%的解釋力為最高者。國外研究甚至發現父親表現對孩子的父職行為有重要關聯，孩子若成長在有父親的家庭環境裡，較不容易提前成為青少年的父親(Furstenberg & Weiss, 2000)，對於孩子生活參與愈低，青少年的負面社會行為就越多(Salem et al., 1998)。從上述研究中可以發現父親對孩子的影響，自幼兒階段到成年期都有，再度顯現父職的重要性。

為了探究影響父親成為「負責任的親職角色」因素，相當多的學者投入研究。為便於理解，茲將研究所得的影響因素，依來源分類整理如表 8，並說明如下：

一、家庭因素是分析的重點

國內外討論的焦點都在家庭部分，但是國內偏重於個人因素面，尤其是針對父親本身的分析最多，尤其近幾年來的研究都提到「父職意願」是影響父職表現最重要者。如蕭春媚(2001)發現父親角色意願較以往有增進的趨勢，並對於父職的辛苦較能認同；而年輕的父親對於親職教育需求較多也較高(莫藜藜，1998)，但是整個參與面上仍落後母親甚多，主要的原因與整個社會文化的關聯甚大(王舒芸、余漢儀，1997；王叢桂，2000a)。國外學者雖

然也重視父親的因素，但是對於家人互動、家庭結構或組成上等的不同家庭因素探討的也不少，比較特別的像是「父親是否與孩子同住」(Furstenberg & Weiss, 2000; Shapiro & Lambert, 1999)、「孩子是否婚生」(Eggebeen & Knoester, 2001)、兄長當父親的年齡(Dearden et al., 1994; Furstenberg & Weiss, 2000)等，分析的因素面較國內要多元些。

表 8 1991-2004 年父職研究-影響父職的因素歸納

國別		國內	國外
因素別			
家庭因素	個人	父親 教育程度、性別角色特質、年齡、親職意願、家庭價值觀、教養觀、角色認同、親職需求、親職資源、原生父職經驗	教育程度、人格特質、意願、工作感受、成為父親的年齡、父親類型、對法制面的不滿、參與教會活動、親職的成就感
	母親	就業與否、親職意願	就業與否、婚姻滿意度、教育程度、父職觀、性別角色態度
	孩子	年級、排行、幼兒氣質、性別、對父親行為的反應、學業成績	排行、年齡、手足性別組成
	家人互動	父子關係、父母婚姻關係、妻子支持、其他家人資源、	父子關係、夫妻互信、夫妻親職分享、前妻支持、母子相處時間、與孩子相處時間、
	其他	婚姻狀況、社經地位、子女數	家庭經濟環境、婚姻狀況、家庭型態、父親是否與孩子同住、離婚時間長度、孩子是否婚生、兄長當父親的年齡
	家庭外因素	社會父職觀、父或母親的工作結構（工作時數、忙碌情形、彈性）	經濟與政治變動、歷史演進、種族、母親工作結構（工作時段）社會政策、社區貧窮、

註：加深字體—表示此因因素為國內外學者研究發現相同者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二、家庭外因素大小不一

關於家庭外因素的分析，兩地學者都注意到父親或母親的工作面，如

父親的工作型態、工作時間及工作的專業程度都會影響父職的行為。基本上父親工作時數長者對於涉入孩子的生活面向較少(陳淑貞, 1993), 能參與的家庭或是家務的時間就少(徐宗國, 1993), 但若是工作環境能提供較彈性時間且支持親職時, 父職的壓力較小且表現會較佳(林莉菁、鄭麗珍, 2001)。除了父親或母親的工作因素外, 國外學者從大環境面切入討論的更多, 像是社區環境(Thronberry et al., 1997)、國家相關政策與促進父職的關聯(Brown, 2000; Cabrera & Peters, 2000)、種族差異(Averett et al., 2000; Marsiglio & Cohan, 2000), 與政治經濟因素(LaRossa & Reitzes, 1993; LaRossa et al., 2000; Marsiglio & Cohan, 2000)都是國內研究中看不到的主題。

整體來說, 影響父職的因素非常多, 這種小自個人大到社會國家的因素分布, 相當符合多位學者「父職是社會建構」的觀點。

從以往研究可以發現有關父職意涵的討論似乎呈現百花齊放的現象。一部分學者忙著檢視父親究竟做了哪些工作內容, 發現與以往認定的母職範疇沒有差別, 或許是父母親的表現方法有所不同, 才導致子女有不同感受。另有學者認為父職就是親職, 將父親工作項目進行細部分類的意義不大, 應了解父親與孩子互動的形式—以面對面、父子實際接觸的「約會」模式互動最密切, 而以參與子女發展的「負責任」模式為最廣義的親子互動, 同時也是最難明確說明父職形式者。然而社會期望父親能扮演更盡職的親職, 因此不論採取哪種角度切入父職意涵的討論, 都會分析影響父職盡責的因素, 資料顯示這些因素分部的面向多元, 相當符合生態系統理論的觀點, 因此本研究將以此論作為研究的理論依據, 並於下節進一步加以介紹。

第三節 生態系統理論及父職研究分析

Lewin 曾提醒「沒有什麼比一個好理論，更有實用價值」，而 Bronfenbrenner (1977)更進而指出「一個好的理論若不能轉化為具體可行的『研究行動』，那再好的理論也不過是空談」(引自戴文青，2004)。所以研究與理論有搭配結合之需。國內外父職研究中少數有明確運用理論者，國內缺乏理論應用的現象又較國外嚴重(魏秀珍，2003)。因此，本研究考量家庭研究朝向關注建構及背景脈絡等的發展趨勢(Doherty et al., 1993)，重視理論與研究必須結合的意義(Lavee & Dollahite, 1991)，且基於學者認同「父職」為社會建構、應從多方面探究父職的研究觀點，皆與生態系統理論意涵相符，故選用生態系統理論為本研究架構基礎，茲對於理論的重要概念與內涵說明如下：

壹、生態系統理論發展簡史

生態系統理論(ecological system theory)是 Bronfenbrenner 於 1979 年受到「系統理論」及「互動論」的啟發與影響而提出，用來解釋個人與環境的互動過程(Bubolz & Sontag, 1993)，是近年來最受歡迎的研究架構之一(謝秀芬，1998)。其實早在 Plato 與 Aristotle 對於人類生活與環境衡定發展的論述中就已提出生態(ecological)的理念，直到十九世紀晚期當人類感知到生存環境問題嚴重後才被科學研究所重視(Bubolz & Sontag, 1993)。

首位將生態的觀念引進家庭領域的則是家政學創始學者 Richards 夫人，她應用生態學的概念於治家工作，但後來因家政領域朝專業發展所產生的分化現象使生態觀點在家庭研究上並未真正受到重視。生態觀點被提出到真正發展成為穩定的理論過程中，涉及多種學科，包括生物、地理、社會、人類、心理、政治、經濟、人類學等(Bubolz & Sontag, 1993)，也因此致使生態理論具有思考面向相當廣闊的特色，當 1979 年 Bronfenbrenner 提出明確的生態系統理論觀點後，生態理論可說進入了蓬勃發展的階段，許多領域都漸漸使用生態系統的觀點進行研究。

一、小系統 (micro-system)

小系統指個人直接面對面接觸或直接參與的人或事物，與個人的接觸最為直接，也最為頻繁，因而對個人的影響最大、最深遠。例如家庭、學校、同儕團體、工作場所等。

二、中間系統 (meso-system)

是指個人直接參與的兩個或兩個以上（小系統的互動連結，例如對孩子說，家庭與學校都是子女直接參與系統，家庭與學校的互動即稱為中間系統，此系統作用力愈明顯或是關係愈強，對個體發展的影響愈大。像是家庭與學校間保持密切聯絡與溝通可以促使學校（老師）、家庭（家長）兩個系統雙雙瞭解子女的世界，以便於真正幫助孩子成長。

三、外部系統 (exo-system)

個體未直接參與的系統，但因透過其直接參與的小系統形成間接影響個人發展的系統稱為外部系統。如對子女而言，家庭與父母工作特質之間的互動關係、家庭與父母社交對象之間的互動關係都是外部系統。換句話說，父母可能會因為工作的特質每天晚歸，而影響了家庭的正常作息，也影響子女的生活習慣。又如，父母的社交朋友都是具有高學業成就取向價值觀者，可能也會影響父母親的教養觀，因而間接影響到子女的教養處遇。

四、大系統 (macro-system)

大系統指的就是社會、文化、次文化、或價值觀等較高層次的系統，這個系統同大時影響外系統、中間系統、及小系統。也就是說，同一個大系統下的外系統、中間系統、小系統都會具有相類似的特質。例如中國文化具有「男主外、女主內」的婚姻與家庭價值觀，因而在社會、街坊鄰居、學校、工作場所、家庭中，我們常期望母親是孩子主要照顧者。

整體而言，生態系統理論提供了一個非常完整的典範，用以解釋個人與環境互動的方式、及其影響的脈絡與範圍。它將家庭系統理論的觀點更為擴大，因為個人的成長不只是受到家庭系統或次系統的影響而已，而是多層環

境的互相影響。黃迺毓（1998）以生態系統理論為理論基礎，對國內父母教養態度的質性研究指出：父母對子女的教養態度受到原生家庭（family of orientation）中父母及手足、夫妻感情、夫妻個人因素、子女特質、家庭社經地位、社會中朋友和鄰居、專家和權威、文化價值觀等---小系統、中間系統、外系統、大系統的影響（黃迺毓，1998），生態系統對個人成長的影響再度得到印證。

參、生態系統理論觀點的父職分析模式

生態系統的界定並非固定的，是依發展個體的改變而界定不同（Bronfenbrenner, 1979）。由於本研究關注父職意涵的形塑脈絡與情境分析，是以父親為界定各生態體系層面的核心發展體，這種界定就不同於以孩子為中心的生態定位。以父親的工作為例，對父親而言是接觸最為頻繁的直接互動環境之一，是父親的「微」系統；但對孩子則並非其直接參與的環境，是透過父親而產生間接的關連影響，故稱為「外」系統。

Doherty, Kouneski & Erickson 在 1998 年參酌 Bronfenbrenner (1979) 的生態定義，提出父職的生態系統模式（圖 2），歸納過去父職研究中對於影響父親行為的因素，提出包括共同親職、母親、情境、孩子、父親本身等五個內涵（Doherty et al., 1998）。該架構圖已提供檢視父職研究的多元面向模式，作為進一步研究的構思基礎，但仔細對照 Bronfenbrenner (1979) 的生態系統理論概念，發現該圖並未完整呈現整個父職的生態面貌。就圖 2 而言，可以看見影響父職的因素應該分成三個個體（父親、母親、孩子）與三種互動（父子、母子、夫妻）關係來討論，但圖中在個體互動的部分只看見了兩條互動線。其中父親是相對於孩子而產生的角色，所以父子互動就是父職的主要意義，是最粗線的部分。另外也看見了父母互動的關係因素，Doherty 等學者(1998)將其整理為「共同親職的因素」；然而獨缺「母子互動」的關係面。「母子互動關係」或許與母親因素中「對父親的支持」或是「對父親的態度」相似，但就對象來說母子互動涉及母親與孩子兩者，母親因素則強調母親單方面對於父親的感受與態度，並不相同。研究者亦用此模式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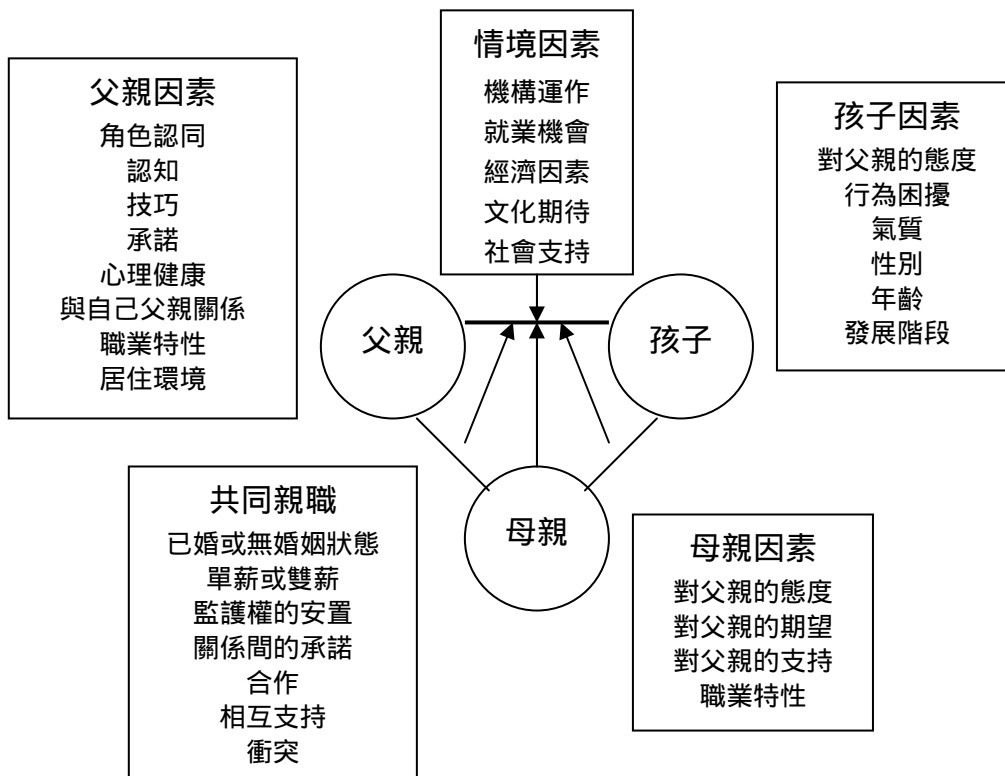


圖 2 影響負責任父職的概念模式

資料來源：Doherty, Kouneski & Erickson (1998)

析近 20 年來國內父職研究時，發現各面向的因素面都有學者探討並獲支持（魏秀珍，2003），但國內外發現的因素內涵不盡相同，一一羅列不盡周全，因此研究者將父職議題明確標出，註明六種因素面，但依照生態系統理論的概念，情境因素屬於影響每個系統的大系統層次，故將其挑出置於所有因素之外，再補上母子互動因素面向後，將個人因素以圖框「□」表示，互動面向以圖框「○」表示，修正父職的生態系統建構模式（圖 3），並就六種因素面向的支持發現簡要說明於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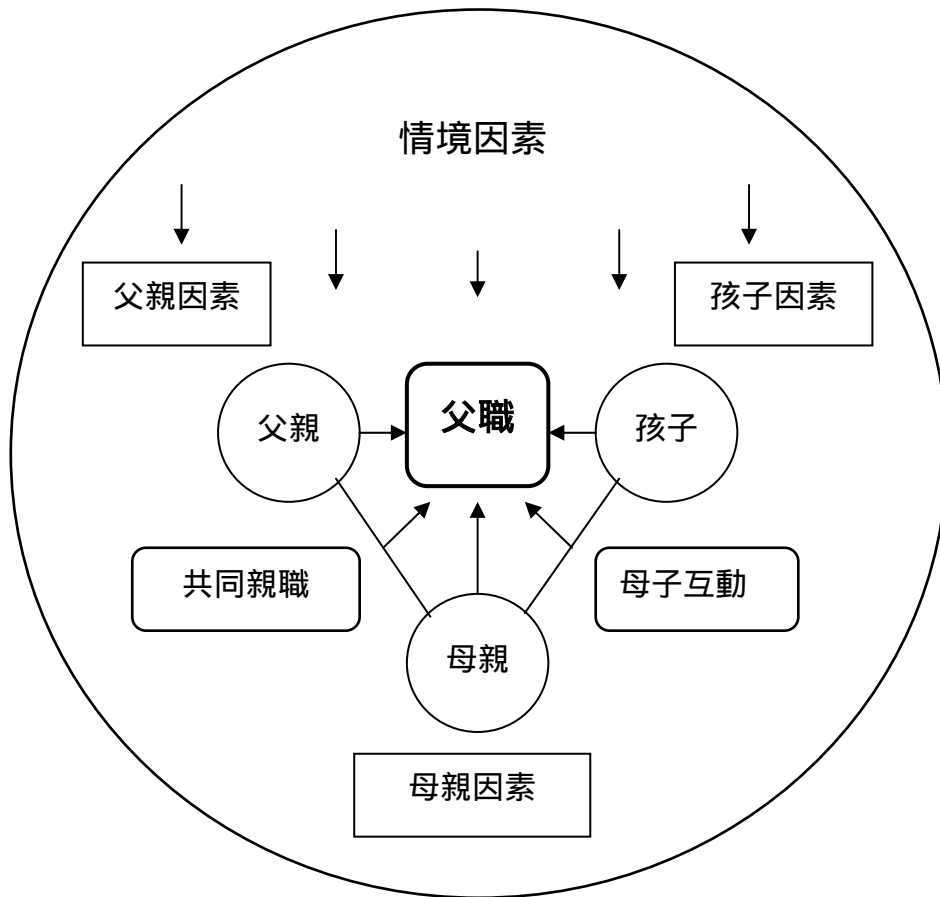


圖 3 父職的生態系統建構模式

資料來源：修正自 Doherty, Kouneski & Erickson (1998)

一、父親因素—父親本身的職責意識與認知是促使父親行為表現的重要因素

雖然有許多因素可能已經對於社會大眾的父親概念或職責表現形成負面影響（何斐綾，2001；張佩韻，1999；蕭春媚，2001），但是父親本身的意願、對於家庭的承諾則是克服關鍵（王舒芸、余漢儀，1997；胡蓮珍，2000；Marsiglio, Hutchinson & Cohan, 2000），當父親感受擔任親職的成就與滿意時，會更增進其扮演父職的意願（Cooney, Pedersen, Indelicato & Palkovitz, 1993; Madden-Derdich & Leonard, 2000），當父親重視層面不同時就影響了父職的實踐面向（吳黛宜，2003）。另外，男性與原生家庭的互動或是與父親的關係也發生影響力（王麗玲，1996，引自黃慧森，2001；王叢桂，2000a；Daly, 1996; Furstenberg & Weiss, 2000）。

還有父親的職業類型、教育程度也與父職表現有關，大致來說教育程度愈高、職業類型愈專業，較有利於父職實踐（王麗玲，1996，引自黃慧森，

2001；吳黛宜，2003；林莉菁、鄭麗珍，2001；林震雯，1993；陳淑貞，1993；張佩韻，1999；蔡佳宜，2000；鄭惠環，2005；Cooney, Pedersen, Indelicato & Palkovitz, 1993；Hewlett, 2000），工作的時間或時段會影響父職的履行狀況，有的研究指出彈性的工作結構有助父職（王舒芸，1996；張佩韻，1999；Averett, Gennetian & Peters, 2000），工作時段與工作的時間長度都會對父職的表現產生排擠作用（王舒芸，1996，李正傑，2001；Brayfield, 1995；Daly, 1993）。

二、母親因素--母親扮演著影響父子關係的重要角色

有研究發現母親的教育程度與非同住父親的父職行為有關（King, 1994），母親有工作會促使父親參與親職（吳明曄，1997；莫藜藜、王行，1996；Harris & Morgan, 1991），而母親的工作時間、工作量（徐宗國，1993）、工作時段也對父職行為造成影響（Brayfield, 1995）；但也有學者認為母親就業與否與養育性父職的增加關聯不大（Atkinson & Blackwelder, 1993）。

除了母親的工作外，母親的婚姻關係滿意度與父職參與有正相關

（Harris & Morgan, 1991；McbrBide & Rane, 1998），若母親滿意於父職表現，或信任、支持父職，也有利於父親盡職（King & Heard, 1999；Madden-Derdich & Leonard, 2000；McbrBide & Rane, 1998）。但也有學者發現母親阻礙父親盡職，Allen & Hawkins（1999）認為母親限制父親參與家務，如同「守門員 gate keeper」影響了父職表現，Braver & Griffin（2000）指出離婚後母親會限制父親與孩子共處，亦不利父職，還有學者發現母親偏好父親提供金錢上的支持多於對孩子的情感性投入，傷害父親的感受（Hamer, 1998）。

三、共同親職因素--父子關係與夫妻關係有高相關

研究指出夫妻的婚姻關係會影響父職，不僅婚姻結構情形（是否有婚姻關係）對父職表現有影響（林莉菁、鄭麗珍，2001；黃慧森，2001；林妙娟，1989；劉彥君，1998；Cox, Owen & Henderson, 1989；Eggebeen & Knoester, 2001；Shapiro & Lambert, 1999）外，夫妻互動的品質也是重要關鍵，學者指出父職角色的成功必須以良好的夫妻關係為前提（Amato & Rezac, 1994），許多研究都發現好的夫妻關係會增進父職行為（王麗玲，1996，引自黃慧森，

2001；李淑娟，1996；黃慧森，2001；Cooney, et al., 1993；McbrBide & Rane, 1998；Orbuch, Thomton & Cancio, 2000）。

四、孩子因素—孩子本身的特性也會影響父親行為

不少研究發現孩子的年齡、排行、氣質或是性別會影響父親的表現（李淑娟，1996；陳淑貞，1993；蔡佳宜，2000；Eggebeen & Knoester, 2001；Glass, 1998；Harris & Morgan, 1991；Salt, 1991；Yeung, Duncan & Hill, 2000），父親的教養態度會因孩子數有差異（吳邱雯、穆仁和，1997；莫藜藜、王行，1996），孩子數多的父親有較高的親職教育需求（莫藜藜，1998）。

五、母子互動因素—母親與孩子的關係對父子互動造成影響

從理論來說，當孩子與母親關係較親密時，可能牽制了父子的親密互動，但也可能對父子關係形成加分作用。不過實證的研究較少。Cooksey & Fondell（1996）研究 1250 個有 18 歲以下孩子的家庭，發現父親和孩子相處的時間與母子共處時間有正向關係，指出父親參與親職時間也會帶動母親對親職工作的投入量。

六、情境因素—社會文化、環境都會影響民眾的父親概念、對父職的期許

根據學者的研究指出經濟環境條件對父職的影響最明顯，尤其強調父親是家中經濟支柱的文化觀，誤導以往研究父職的焦點在生計貢獻角色而少談情感層次的父職（Copenhaver & Eisler, 2000）。像是家庭所處的社經地位會影響父職的態度（涂秀琴，1999；陳曉慧，1999），社經地位多半是父職的加分因素，即社經地位愈高的父職表現愈多或愈好（吳黛宜，2003；陳曉慧，1999；蔡佳宜 2000；鄭惠環，2005）。經濟大環境的條件則對父職造成壓力（LaRossa & Reitze, 1993），社區或家庭貧窮不利父職正常運作（Thronberry et al., 1997），父職扮演有種族之別（Averett et al., 2000；King, 1994；Marsiglio, Hutchinson & Cohan, 2000），或因政治局勢而有變化（LaRossa et al., 2000；Marsiglio et al., 2000），政府及政策上的支持，或是父職課程的介入，其作用不可忽視（黃慧森，2001；Braver & Griffin, 2000；Cabrera & Peters, 2000），另有研究強調宗教信仰對於父親參與有正面影響（King, 2003），而整個大社

會的父職價值文化影響力更是處處存在（何斐綾，2001；蕭春媚，2001；Hewelett, 2000; Lamb, 2000）

就圖 3 父職的生態系統模式來說，似乎看不出明顯的生態層次。一來因為圖中的父職是明確的界定在父-子關係線上，而不是放在個人(父親或孩子)身上；再則各因素面中涵括不同的系統層次，沒有呈現巢狀相套疊的關係。不過 Bronfenbrenner (1979) 的生態系統中強調的「人-境交錯」或是「人-境共舞」的系統（戴文青，2004）關係，仍舊可以該模式圖中看出。

概括而言，國內外的父職研究，幾乎少有明確運用生態系統作為研究架構者，多半是在研究發現或結論時提到影響父親角色的因素並不單純，或是在研究建議中指出應由多方面協助父職的扮演，感覺上像是默認了生態理論的觀點，不過實際研究的支持確實相當少。除了可能與國內父職研究發的歷史不夠遠長有關之外，生態系統理論概念廣不易檢測（Bubolz & Sontag, 1993）也是主因。若以父親為主，採用生態系統的觀點作因素面的分析時，會發現近 20 年來國內父職研究，在四個生態層次中以微系統面的討論最多，外部系統的研究數量次之，再來是大系統的研究，屬於中間系統的研究相當少（魏秀珍，2003），國外的研究也有相似情形。

鑑於前述，本研究根據生態系統理論的精神，參酌 Doherty 等學者(1998) 提出的父職生態系統建構模式，補強以往研究較忽略的母親因素面向後，進一步思考並建構父職意涵生態系統之研究架構，將闡述於第三章。

第四節 軍職父親父職意涵之研究意義

父職研究的發展雖然比母職議題的討論慢，也晚了許多，但是國內這二十多年來的相關研究確實進步不少，不過對於軍人家庭的父職意涵探討則尚未有之。我國政府於 2004 年(民國 93 年)正式通過家庭教育法的立法程序，對於促進家庭教育的推動有極大的助益，不過對於職業軍人來說，並沒有明確的機制可以讓他們有機會在軍職生活中接觸經營家庭生活的知能，而過去軍人的養成教育內容亦無相關內涵，所以或許可以大膽的說促進軍人家庭福祉的任務要比一般家庭困難，這也促使軍人家庭的父職議題有著特殊的重要性。以下分別就軍人家庭的特質、軍人職業對經營家庭的影響及近年國內外有關軍人家庭的研究資料進一步說明。

壹、軍職家庭的特色與其家庭經營問題

學術上對於「家庭」的討論由來已久，綜觀不同學門及學者的定義，即使為適應社會變遷與家庭型態的多樣化漸漸修正內涵，但是對於家庭的核心概念不外乎家庭成員、家庭成員關係、家庭功能三項(Egan, 2002)。基本上以關注家庭的運作能否發揮功能的觀點逐漸取代早期強調家庭的結構模式論述。本研究整理學者的不同說法，應可以從兩個角度來看家庭：

一、**成員關係面**：是個相互提供愛、照顧與支持的獨特組織。

二、**功能面**：家庭具有提供成員教育、情緒\感支持、養育、經濟支持的功能。

軍人是個相當特殊的職業，必須全天候奉獻其體能與智慧，不斷的面對挑戰 (Albano, 2002)，隨時奉調至任何地方，竭力盡責完成任務，需接受比一般職業嚴格的軍事法規，公民權亦會受到部分限制，還需經常忍受與家人長期分離的痛苦，如果沒有眷屬們的愛及支持，讓軍人無後顧之憂的為國效

力，將影響其軍事生活的品質而連帶拖累軍事效能（洪陸訓、段復初，2000）。究竟軍人職業特殊之處為何？為了履行家庭的功能及角色，軍人家眷在配合軍人職業時可能形成的特殊的家庭現象又有哪些？由於國內可供參考資料非常少而且多在於總體性的軍人生涯議題上，因此在參酌美國軍方的家庭研究資料（Bloomstrom, 2002; Drumment, Coleman & Cable, 2003; Egan, 2002; Martin, Mancini & Bowen, 2002）另輔以國內相關之少數文獻，大致可以發現變動性與長時間離家對家庭造成極大影響，致使軍人家庭的運作產生其特有現象，茲分析如下：

一、軍職帶給家庭的優勢因子

（一）家人有因應多「變動」的彈性（Bloomstrom, 2002; Egan, 2002）

軍人因其職務關係，必須做區域上的更動，家人甚至必須配合軍人的職務跟著搬家，常常會面對新的人、事、物的局面，因此比一般家庭成員有面對多樣變化的生活模式，有較多學彈性因應新環境的機會與能力。

（二）有機會感受多元文化（Egan, 2002）

承續前面的特質，有些軍人甚至會調至國外，因此有機會接觸更多的國家與民族，增進其多元文化的視野。

（三）可以廣交「異」友（Egan, 2002）

因著軍人必須經常調職的特色，軍人及其家庭成員會在不同的地區生活，因此有機會認識更多的朋友，可以發展多樣化的友誼。

（四）福利的配套（洪陸訓、段復初，2000）

政府對於軍人有特別的福利制度。像是軍人家庭享有水電費優惠計價的福利，眷屬享有軍方醫療體系的照顧機會，軍人免繳所得稅等的家庭福利。但是相較於國外的福利措施，國內對於軍人的家庭照顧相去甚遠。

二、軍職帶給家庭的經營壓力多

經由前述可知軍人因其職業的變動性，似乎為家庭帶來比其他職業家庭較多的生活環境變化機會，有利於個體適應不同生活模式與增進多元文化的視野。然而研究資料卻也同時指出如此變動的生活模式讓軍人家庭遭受生活適應的問題。

(一) 經常面對新環境的壓力調適 (Egan, 2002; Martin et al., 2002; Robbins, 2002)

就軍人本身來說，職務調動的機率頻繁，雖說可以經常面對不同事物與經驗，但是新的生活面向伴隨適應的壓力，家屬也有類似問題：

1. 工作上的適應壓力-包括同儕與長官、部屬間的適應。
2. 朋友關係變動頻繁-尤其是對家人來說，好不容易適應的生活與朋友，因為跟隨軍人職務變動而中斷，即使拜現代科技之助可以跨越時空維繫親友情誼；然而仍舊比不上面對面的友伴感情，因此孩子與家人總是不斷面對友伴分離與再結交新朋友的壓力。

(二) 經營家庭關係的壓力 (Albano, 2002; Drumment et al., 2003; Martin et al., 2002; Robbins, 2002)

就算是家庭與軍人服務單位距離不遠，軍人因為職務之需依舊無法經常回家，家庭生活參與率低，讓軍人及家庭成員間都有相處上的困擾：

1. 家庭時間短缺，經營家庭困難

24小時的軍職工作特性，即使在少有的假日時間，也屬於待命情境，因此與家人聚少離多，對自己的原生家庭與婚姻家庭的經營上都異常辛苦。

2. 工作特質干擾家庭運作與家人關係

職業的特質是被要求絕對的服從與沒有異議式的階層文化，這種工作模式習慣似乎嚴重影響家人關係。尤其與孩子的相處上，幾乎會套用軍中命令式的模式教養孩子，因此，親子關係相當緊張。

3. 缺席的家人角色，是配偶長期的負擔

連帶影響的是軍人的家庭角色明顯缺席。對孩子來說很辛苦，對配偶來說更是常常難以適應。因為不確定的回家時間與在家時間長度，配偶必須扮演補償軍人離家的親職角色與責任，當軍人返家後，更必須提供相關家庭的訊息，以協助離家軍人的家庭生活調適。

歸結來說，從事軍職與其他行業最大不同的特性之一便是將家庭的認同順序明顯的置於國家與全體人民之後。以美國學者（Egan, 2002）提供軍人入職後的宣示內容為例：「必須誓死效忠國家及元首，絕對保護並防衛任何威脅國家與人民安全的國內外敵人。」。我國對於軍人的教戰總則亦強調「凡有侵犯我領土主權，及妨礙我主義之實行者，需全力掃除而廓清之」（國防部，1985）。換言之，軍人對於國家的效忠就如同家人必須對家庭盡最大的保護職責一樣，只是對軍人來說，他們必須先將「國家」的這個「家庭」先於他們自己生活中的「家庭」。基於「國先於家」的職責使命，以及高變動性的職業屬性令軍人家庭格外特出於其他家庭。軍人職業帶給軍人本身及家庭的影響皆是其他職業無法想像的，或許變動的特色是促進生活多樣化的優勢；但是對於生活的適應與孩子的成長來說，似乎需要更多的資源來協助他們面對這樣變化所帶來的壓力與困擾。

貳、軍職家庭的研究現況

國內關於軍人的研究資料相當少，應與國防安全考量有關。軍職體系中可以閱讀的資料不外乎提升國家戰力與如何維持忠誠等的議題，近年來探討軍官的生涯發展議題漸多，但是對家庭的討論則非常少，即使偶有論及家庭，也都例舉具宣示作用的「超標準」楷模資料，重點在於教育軍人家庭成員如何用心經營家庭使軍人無後顧之憂的為國效力，但是對於軍人及眷屬應該如何因應軍人職業特性所帶來的困擾卻不見具體的引導與安置。

一、美國重視軍人家庭福祉

美國相當重視軍人的家庭福祉（洪陸訓、段復初，2000），自 1960 年代

迄今在各營區內設立的「家庭服務中心 (family service center)」，透過專業社會工作軍官 (social work officers) 及軍中牧師 (chaplains) 提供相關家庭諮商服務，服務的時間點從成為軍人角色開始，協助處理結婚、離家等的調適，強化剛形成的婚姻關係，一直到增進家庭的穩固 (Bloomstrom, 2002)，目的皆在協助美軍士官兵及其眷屬因應軍隊與家庭間的生活適應問題 (楊菊吟, 1998)，另外也隨時因應國家對軍人的需要與任務的調整修正照顧軍人家庭的內容，其儘可能的周延及完善性設計深獲美國家庭及社會工作學者的讚揚 (Martin et al., 2002)。

Mertensmeyer, Matthew & Hughes (2002)指出軍人職業的高權威性及階層組織模式，極易促使軍人成為嚴格權威的親職角色，無疑增加了軍職家庭的壓力。美國國防部洞悉軍人家庭比一般家庭具有其獨特性的挑戰--軍職家庭遠離一般民眾、欠缺社會支持，難獲親職資源，因此特別針對軍人家庭的親職議題，於 1999 年提出的「新親職方案 (New Parent Support Programs)」，編於軍方服務 (Military Service) 項中，是一種預防性的親職教育觀點，設定在軍人成為親職角色的第一年提供服務 (Military Family Resource Center, 2000, 引自 National Council on Family Relations, 2002)。

美國家庭研究學者已經開始關注軍人家庭的議題，家庭關係與諮詢國家中心 (National Council on Family Relations, 簡稱 NCFR) 特別探討軍人家庭的議題，且編輯專刊。文中提到邁入 21 世紀後，國防部「軍人家庭資源中心 (Military Family Resource Center)」提出強化軍人家庭的支持構想，企圖增進軍人家庭的生活素質。足見美國政府一直扮演主動協助軍人家庭的支持角色。

二、國內軍人家庭相關研究

相較於美國，政府並未針對軍人家庭訂有明確的協助政策，既有的福利內容早已不符實際效益 (洪陸訓、段復初, 2000)，關於軍人家庭的研究資料更是少見。研究者於今年 (2004) 5 月曾以「軍人家庭」、「軍官家庭」、「國軍家庭」關鍵詞進行線上中文整合資料庫中查詢文獻，僅發現朱美珍 (2002) 與黃靜儀 (2002) 兩篇，但是分別查詢「軍人」、「軍官」、「國軍」時的資料則很多，瀏覽主題及摘要內容，發現以探討國軍的制度與如何管理的議題為

主，近年則增加較多有關於軍人生涯的討論。直至去年（2004）7月後又查得吳慶元（2004）與楊櫻華（2004）的軍人家庭議題相關研究，其中參酌楊櫻華（2004）之女性軍訓教官的研究中以就軍隊、軍人等的關鍵詞作國內文獻搜尋與整理，因此本研究根據該文獻提供的研究資料作進一步查詢及閱讀，加上其他研究相關文獻歸納出近年來與軍人家庭有關的研究發現，均不脫離軍職文化與家庭生活間的拉距窘況，茲整理如表9並簡述如下：

（一）軍職文化對家庭經營造成潛在的負面影響

研究中幾乎都有提到軍隊是個強調與強化傳統男性陽剛特質的組織。要求服從與效率的軍事文化與家庭強調的溫暖及關懷特質大異其趣，而遠超過家庭時間的軍隊生活，令軍人在家庭生活中亦難以跳脫部隊管理式思維，造成家人關係的緊張與疏離（朱美珍，2002；吳慶元，2004；黃秀美，2002；黃建霖，2004；黃靜儀，2002；楊櫻華，2004）。

（二）軍人職業需要與家庭經營衝突性大

軍人工作先於家庭的職業文化，讓他們面對想投入家庭的身心交戰問題（朱美珍，2002；吳慶元，2004；黃建霖，2004；楊櫻華，2004）。

（三）軍人家庭可用資源網絡窄小，令家人處於家庭經營困境中

每個家庭都有需要適應與經營的難題，但是軍人家庭卻因為前述之軍人職業文化與工作的特性對家庭造成極大的衝擊，從事軍職的家人形同家庭缺席，猶如另類單親家庭（黃靜儀，2002），配偶與家人連帶受累。然而從他們尋求解決的策略中看見幾乎只靠自己的個人資源（吳慶元，2004；楊櫻華，2004），軍方並無相關機構可提供諮商與協助。一旦家人無法伸出援手而自己又無法調適時，家庭危機隨時可現。

表 9 國內軍人家庭議題相關之碩博士論文研究資料與整理

作者 (時間)	題目	研究對象/ 資料	研究法		測量 方式/ 工具	與本研究相關之研究發現
			量	質		
朱美珍 (2002)	民生主義社會政策與軍人家庭關係之研究--已婚軍官角色衝突及其生活滿意之分析	1.1390 位軍官問卷 2 訪談 8 位軍官	✓	✓	自編問卷	(1)約 1/3 軍人自陳家庭與工作角色衝突大 (2)有 2、3 成表示軍職是無法兼顧家庭的工作 (3)配偶不能體諒工作性質而要求軍人轉職的困擾
黃靜儀 (2002)	另類女人：駐防軍人妻子生活經驗之質性研究	5 位駐防軍官之妻		✓	個別訪談	(1)「安定」是嫁給軍人的主因 (2)軍人妻家庭角色壓力大、社會資源網絡甚窄 (3)長期缺乏父職影響孩子發展
蔡明輝 (2002)	工作生活品質，工作生活品質效能與離職傾向關連性之實證研究	785 位軍官	✓		自編問卷	(1)軍人喜歡從事能兼顧家庭的工作 (2)家庭影響軍職工作滿意的不同構面
黃秀美 (2002)	國軍志願役中年退役軍官生涯轉換之分析研究	中年退役軍官		✓	個別訪談	(1)退役前採父權的家庭角色規準 (2)調動頻繁之工作性質導致與家人關係疏離 (3)退役後以補償心態投入家庭
蔡淑雯 (2004)	國軍志願役軍官婚姻態度、擇偶條件、擇偶動機與婚姻滿意之關係	619 志願役軍官	✓		自編問卷	(1)大部分軍官均想追求婚姻生活 (2)配偶父母婚姻和諧度影響家庭與婚姻 (3)陸軍比空及海軍軍種的家庭穩定度高 (4)軍人離婚率較一般人低
黃建霖 (2004)	國軍已婚女性軍士官工作投入、家庭投入、角色衝突與離職傾向關係之研究	294 位已婚女性軍官	✓		自編問卷	(1)工作環境、工作投入、家庭投入都會影響家庭與工作衝突 (2)工作投入、家庭投入、家庭與工作衝突均響影離職傾向 (3)工作環境透過工作投入間接影響工作與家庭衝突
吳慶元 (2004)	軍人父職角色主觀經驗之探討	15 位已婚軍官父親		✓	個別訪談	(1)因應家庭與職業需要產生角色游移現象，工作文化與家庭交疊衝突 (2)國家為先、家庭次要的選擇取向 (3)缺席的父職靠配偶作為與子女的相處橋樑，增進父職效能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在蔡淑雯（2004）的研究中發現軍官與一般社會大眾一樣：多半希望追求婚姻生活，並相當重視配偶的聰穎程度與自己的相近性。可見軍人意識到自己職業將造成家庭經營的困擾而希望找到有獨立治家與因應問題能力的伴侶。雖然該研究也發現軍官的離婚率較一般社會人士低的可喜現象，但是也有研究指出婚姻滿意度高的是非作戰單位的軍官（朱美珍，1998）。換言之，絕大多數的駐防軍官之婚姻滿意度可能面臨較大的變數危機。

綜言之，這些有關於軍人家庭議題的研究都指陳一個共同的意涵——軍人家庭在經營上確實有較多的困擾，而這些困擾與軍人的職業文化及工作性質都密不可分，可說是形成負面的潛在因素。楊菊吟（1998）以家庭福利服務的觀點闡述軍人因職業特性而較容易導致較多家庭問題，同時引述美國學者 Del Martin（1976）的說法令人印象深刻：「軍隊是暴力訓練的學校，不論個人在進入這個軍隊訓練的過程之前，表現多麼和平及敏感，進入軍隊社會化的訓練過程，他就要被完全訓練成『戰爭的代替者』」（Del Martin, 1976, 引自楊菊吟，1998）。許多國外有關軍人的研究也都提到軍人因其角色壓力及暴力訓練的特質，令軍人家庭暴力問題比一般家庭陷入較高危險性（楊菊吟，1998）。可見得正視軍人家庭的特性與經營需求是政府安定軍心的工作項目，也是從事家庭教育作者的努力方向之一。當陳水扁總統提出軍人三安——「軍隊安全」、「軍人安家」、「軍眷安心」的觀念（洪陸訓、段復初，2000），明確指出軍人家庭的照顧是不容忽視的議題；然而這對加軍人家庭政策的推動似乎遠不及教育部主導的家庭教育工作有起色，政府彰顯照顧軍人家庭的美意現然需要更多人關心與努力。更加凸顯本研究之意義及重要性。

參、軍職父親之父職意涵的研究意義

經由前述可以了解軍人因其職業特性，嚴重影響其家庭運作模式。同時也看見美國為軍人家庭「量身打造」的家庭服務內容。相形之下，國內對於軍人家庭的照顧政策零散而不具時代性，許多早期的軍人福利早在全面生活水準提升與政府陸續推動的政策規劃下而不見效能（蔡宏昭，2003）：像是軍人及眷屬的醫療照顧福利也在全民健保的開展後顯得意義不大（更何況

軍人也加入健保體系)；又如早期福利站提供軍公教人員廉價的生活用品減低生活負擔的美意，也在大型量飯店的設置下失去作用。

這些年來政府雖已關注家庭教育的重要而致力促進家庭的法規與展開各式教育活動，但這個近 10 萬之大的軍人家庭（朱美珍，2002），似乎是被遺忘的一群。隨著社會演進，軍人家庭需要的照顧也像一般家庭一樣應注重家人關係與家庭功能面的議題，甚至比其他家庭更須被關注。承續前面文獻資料可之軍人家庭中的親職問題最應被優先關注，成為父母對軍人來說，就像是另一項挑戰（Mertensmeyer et al., 2002），而且是個沒有任何學習經驗與任務指導的挑戰，更何況軍人職業特性甚至對親職工作具有潛在性的威脅，由於我國現有的軍人人口中九成以上為男性（朱美珍，2002），可見當軍人組成家庭生養子女時，面對的絕大多是父職的問題。

根據國內外有關父職研究的資料已經顯示出「父親」本身對於父職的解讀是最具有影響父親表現的重要因素。對於軍人來說，在少有時間資源的職業特性限制下，自己與家人對於父職的意涵究竟與一般家庭的觀點有何不同，這是面對廣大軍人家庭群們，想要找到適應家庭生活的平衡機制中非常重要的環節。從事家庭研究工作者，皆相信家庭的穩定絕對影響個人生涯的發展。在幾篇軍人家庭的研究中，看見軍人本身對於父親角色的困擾、軍人妻子與家人對於父親角色必須較他人失職的無奈，就在這倡議父職研究應被重視的風潮裡，軍人父親角色豈容再被忽視？尤其從軍人養成的過程來看，軍人可能是最缺乏關於婚姻與家庭經營方面的知能，可稱為不利父職的先天不良因素。再則，受迫於大環境下的限制，軍人必須以國重於家的生活理念，使得他們必須對國家安全負責而忽略家庭，可說是父職不利的後天因素。從事軍職所享有國家一些福利並未與時俱進而顯得意義不大，更何況從為針對軍人家庭的特性與需求而設計，對於需要投注時間與精力的經營家庭工作來說，要如何協助他們找到適應與自處之道？

從國外研究的啟示發現，與孩子不同住的父親，親子關係非常薄弱而且不和諧（Amato & Rezac, 1994; Braver & Griffin, 2000），Watson (1995) 提及

軍人父親本身害怕被子女遺忘或不受歡迎的焦慮（引自朱美珍，2002），這應與軍人扮演缺席的爸爸角色有關。然而較早期的研究觀點並未如此肯定，Bill (1970, 1974) 與 Herzon & Sudia (1973) 提出父職缺位（father absence）可能會增加孩子與家庭發展上的困難，但表示並沒有強力的證據支持這種看法（引自 Hillenbrand, 1976）。還有學者論述父親缺位的正面效用，Lessing, Zagorin & Nelsony (1970) 發現父親缺位的中年級學童，他們的智力平均數、理解與口語能力分數比較高，Pedersen 在 1966 年針對男性軍人的研究，提及父親缺位的軍職男性情緒調整能力較佳（引自 Hillenbrand, 1976），雖然當時對於父親缺位會對家庭與孩子產生的作用觀點不一，但是父親缺位並非家庭常態，(Garnezy, 1974, 引自 Hillenbrand, 1976)，確實會影響家庭的運作，近期的相關研究結果多半對父親缺位持負面看法，所以美國的家庭政策，都鼓勵非監護的父親應照顧孩子的福祉，以改善母親單親家庭中的貧窮及提升孩子的福祉（Hamer, 1998）。

多數軍人家庭都面臨父親缺位的家庭現象，就算這種缺位在家屬預期中，但從前述文獻可以了解到，軍職確實造成經營家庭上的威脅，國外學者漸漸關注此議題並著手研究如何協助軍人及其眷屬適應的課題，但是國內討論軍人家庭研究則相當少，研究父職議題僅研究者（Wei, 2003）與吳慶元（2004）兩篇，這兩篇質性研究都指出軍職父親所持的父職觀點，發現軍人爸爸們自覺扮演親職上的無奈與無力現況，但對於軍人在形塑這些父職的脈絡上並無論述。此外，根據生態系統的觀點及過去父職研究的發現，軍人妻子扮演維繫與踐行軍人爸爸的父職角色（吳慶元，2004；黃靜儀，2002；Frank, 1992；Wei, 2003）。因此本研究採生態系統理論的研究觀點，以夫妻配對的研究設計，將能夠針對軍職父親之父職意涵進行較全面性的研究分析，希望釐清軍職這個職場（中間系統）、軍人自己的意念（微系統）、妻子的角色（微系統）對於其擔任父親角色的作用，是如何建構出父職的歷程及脈絡？期望研究結果，能協助軍人扮演合宜的親職角色，為促進軍人的婚姻與家庭生活，提供教育設計的線索，以作為日後規劃可行方案之參考，向落實「讓軍人無後顧之憂」的目標邁進。